

山河动荡的岁月里,无数中国人在坚守中求索、在苦难中奋进。从革命先驱的信仰奔赴,到知识分子的文化自救,再到普通人的乱世求生,三本好书三个视角,带我们读懂近代烽火中国的时代肌理与民族风骨。

——编者

# 以书为证,回望峥嵘

## 百年犹闻醒侬声

□ 方丽娜 赵超义

赵醒依是江西早期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也是江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与袁玉冰、方志敏并称为中共“江西三杰”。1926年9月16日,在北伐军攻克南昌的前三日,赵醒依被北洋军阀江西地方当局秘密杀害于南昌德胜门外,年仅34岁。

在赵醒依英勇就义100周年之际,由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南昌市方志敏烈士纪念馆编写的《赵醒依文存》,近期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书汇集赵醒依研究方面的新发现和新成果,增补关键史料,还原历史细节。其中,收录赵醒依撰写文稿、文件36篇,包括从中国台北国民党党史馆最新发现的赵醒依于1924年至1925年撰写的4份报告;回忆纪念赵醒依的文章21篇;和赵醒依有关的中共中央、江西地方团文件等革命文献59篇以及113篇新闻报道。本书较1994年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著的《赵醒依专集》新增了122篇文章,同时根据新发现的史料撰写的“赵醒依年谱”,作为重要部分收录于本书。

赵醒依,原名赵从干,1892年出生于江西南丰县城一个贫苦的裁缝家庭。青年时期,他辗转湖南长沙、常德和湖北汉口等地做学徒,后到上海当店员,在社会底层的艰辛生活中,开始探寻救国真理。在上海期间,在陈独秀及新青年社编辑部指导下,他参与编辑《上海伙友》周刊;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下,他积极投身工人运动。1921年春,他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我们店里底规矩:做学徒的,必须待老板和众伙友们睡足了,然后方可睡觉。早晨起床,而且必要最早。若然早睡和迟起了一些,就要被打骂。试问一个人能有多少精神;做学徒的都是幼年时代,发育未足,精神天然较大人衰弱。终日地劳劳碌碌,没有片刻休息,难道不要疲倦的吗?迟睡早起,作事时间最多,难道学徒底身体是铁打的吗?唉!他们对于学徒,简直不当人看待!”

中国近现代美学自诞生之初,就承担着救国兴邦的崇高使命。五四以来,美学之所以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重视,是因为审美启蒙被视为重塑国民精神的利器,一批知识分子试图以文艺来改造社会。然而,卢沟桥的烽火让救亡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战乱中的颠沛流离也迫使一批美学家重新思考:美学何以拯救中国?

金浪所著的《再造传统:战时美学的文化想象(1931—1949)》一书,以朱光潜、宗白华、李长之三位美学家为核心个案,在史料与理论的交织阐释中,擘画了一幅战时美学的思想图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战火与硝烟的洗礼,唤醒了华夏儿女血脉中沉潜的精神底色,知识分子也纷纷告别象牙塔与清寂书斋,直面家国危局。对他们而言,最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在思想文化领域发扬民族文化,鼓舞民族志气,复兴民族生命力,因而文化抗战、美学救国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朱光潜在战事吃紧、国家危难之时,却偏偏和青年人谈起了美。

文艺与美学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救亡?抗战期间民族国家的危局,迫使美学家们更深刻地思考文艺之于民族国家的意义。在《文学与民众》中,朱光潜指出:“一个民族的生



▲《赵醒依文存》  
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南昌市方志敏烈士纪念馆 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赵醒依高小尚未毕业便被迫辍学,辗转多地做学徒。学徒生涯受尽压迫,“徒弟徒弟,三年奴隶”,劳作繁重、地位卑微,动辄挨打受骂。他以笔名“惨依”写下《我做学徒时底苦况》(见《赵醒依文存》第2页),记录底层劳动者遭受的剥削屈辱,以及旧制度反人民的黑暗本质。

“我们过了四千多年习俗相传的奴隶生活,这简单头脑,已经被那万恶制度,征服得陈旧不堪了。算得新文化输入以来,我们多少也因此醒转过来,但旧的恶魔,还占了很大的势力,于是‘努力’‘奋斗’的声浪充满了吾人耳鼓。但目前种种制度,多半被经济所支配,当此经济问题没有解决以前,经济之全权尽操于‘恶魔’‘障物’之手,纵使我们竭尽全力和恶势力去奋斗,鲜有不被经济势力所战败……我们若不急起筹一个救济方法,这种改造运动,不是要失败下去吗?”(见《赵醒依文存》第7页《沪滨伙友工读互助团商榷》文)

这篇写于1920年10月28日的文章,是青年赵醒依革命意识觉醒、革命信仰确立的见证。底层苦难生活的淬炼,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促使

他从改良幻想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1922年7月,赵醒依与为寻求革命真理而来到上海的方志敏结识。8月2日,赵醒依介绍方志敏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赵醒依与方志敏一同会见了从南昌来到上海的袁玉冰。中共“江西三杰”的首次会面开启了江西革命的新篇章。他们商议在南昌建立文化书社,“专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革命的书报”“鼓吹革命运动”。这一计划得到青年团中央批准。8月底,方志敏返回南昌筹办文化书社。9月,南昌文化书社正式开业,成为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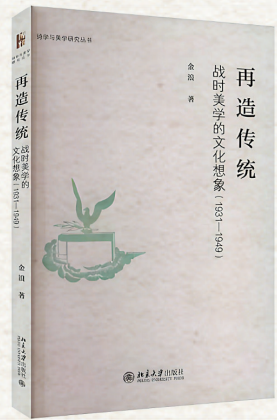
1923年1月20日,他与方志敏等7人发起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不久发展到21名团员,为江西革命培养了第一批骨干力量。3月,赵醒依因参与革命活动被北洋军阀通缉,被迫离开江西前往上海。但他始终心系江西的革命运动,10月,他再次回到江西,恢复并扩大团的组织,并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委员会第一届委员长。

1924年3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赵醒依在南昌筹建共产党组织。经他介绍,方志敏在南昌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中共南昌支部成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赵醒依任书记兼组织干事。11月,赵醒依与方志敏等在南昌建立了江西省第一个农民协会——扬子洲农民协会,先后发展熊德保、陶柱泰、熊祥莲等农民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中共江西地委成立,赵醒依任组织部主任。

赵醒依不仅为建立江西党团组织 and 领导江西革命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还致力于培养党的优秀干部。1924年1月,赵醒依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返回上海,着手为即将建立的黄埔军校秘密组织招生。在黄埔军校一至四期的赣籍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经赵醒依等推荐选拔的,萧素民、李文林、罗英、蓝广孚、邹琦、赵世藩、萧韶、钟赤心、李英等共产党员从军校毕业后,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各地的军事领导人。在培养共产主义运

## 何以需要美学

□ 徐荣先



▲《再造传统:战时美学的文化想象(1931—1949)》  
金浪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创构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呈现李长之在“古典与浪漫之间的文艺复兴”。这三人名学术旨趣各异,却都以时代精神重塑传统,践行以美学拯救中国的理念,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中,建构起兼具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美学体系。

因此,《再造传统:战时美学的文化想象(1931—1949)》以一个独特的视角,不仅还原了一段常被忽视的战时美学史,更让我们看到传统

动人才方面,1924年至1926年间,赵醒依作为江西党团组织的领导人,负责选送江西第一批留苏学员,其中,丁健亚、胡越一、徐褐夫等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王经燕、温春血、邵祖雍、王弼、饶钧、罗文炳、郭景惇、谢光左、夏建中等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些学员回国后,绝大多数成为中共的骨干力量,在各个领域为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赵醒依为革命事业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在秘密工作环境中,他不畏强暴,不避艰险,两次被捕入狱,始终坚贞不屈。1925年12月17日,赵醒依在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途中,在南昌牛行车站被军阀逮捕,后经多方营救出狱。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北洋军阀江西地方当局对共产党人防范极严,疯狂镇压革命力量。8月10日,赵醒依再次在南昌被捕。9月16日,赵醒依被杀害。

赵醒依的牺牲是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1926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刊登《悼赵醒依同志》一文,文中赞誉“醒依同志是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1935年,方志敏身陷囹圄仍深切追念这位亲密战友:“在江西,他却是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运动的第一个牺牲者!”

赵醒依的一生,虽短暂却无比绚烂。从创建江西地方党团组织到领导江西工人运动,从发起江西农民运动到慷慨就义,赵醒依用鲜血与生命铸就了对党忠诚、信仰如磐的政治品格,彰显了敢于斗争、勇于牺牲的英雄气概。《赵醒依文存》所辑录的篇章,是他光辉革命人生的生动写照,更是进行爱党爱国教育的生动教材。赵醒依烈士用短暂而壮烈的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信仰,成为光照赣鄱的革命先驱。他的革命精神,穿越百年风雨,永远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丰碑上,永远镌刻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

(方丽娜为方志敏烈士孙女,赵超义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

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为多难之邦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的实践证明,美学从来不是远离现实的空中楼阁,而是滋养民族精神、涵养民族生命力、凝聚民族力量的宝贵资源。

此外,这本书还在方法论上启示我们:传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精神不断改造和重塑的。它始终保持开放的状态,在每一个与当下的关联和重新阐释中不断生产出来。文明的现代性进程也是这样——作者不写判断,只写自己“在场”。他的诊所开在威海卫路二号,正对跑马厅侧面,他坐在二楼露台上就能看见日军的一举一动。他不是回忆一段历史,而是在交代自己那八年的日子是怎么一天天挨过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知识分子虽身处山河破碎的困厄之中,却依然弦歌不辍,孜孜探索。本书向读者展现了在风雨如晦的年代里,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这些知识分子是如何将美学作为安身立命与振邦兴国之道的;同时也启示我们,在“尊重传统”与“回应时代”之间要寻求一种平衡,传统的再造与新生是永无止境的,是需要代代学者为之倾注心血的未竟的事业。

## 一名中医的抗战生活史

□ 孤舟



▲《抗战时代生活史》  
陈存仁 著  
上海三联书店

陈存仁是中医,师从丁甘仁、章太炎,编过《中国药学大辞典》,办过上海第一份医药卫生报纸。1929年国民政府要废止中医,他反对,是赴南京请愿的五个代表之一。这些履历他在《抗战时代生活史》中一笔带过。书里主要描述的,是他作为上海一个普通市民,在沦陷区八年里的生存实录。

战事未起,日军的间谍已经渗透到上海市政府情报处。市长俞鸿钧的办公室刚搬进法租界,当天下午,日本同盟社就送来了参考资料。作者写这一段时,笔调克制,没有愤激的议论。他用白描手法写这种深度的渗透,反而让人感到窒息。当时上海人以为自己还能在租界里苟安,却不知道脚下早已不是安全的地方了。

陈存仁写这本书有一个天然的视角,就是他的职业。医生是那个时代少数可以穿行于各个阶层的人,病家请出诊,他就得去。他去过七十六号魔窟给吴四宝的部下治伤寒,进过跑马厅给马夫阿昌看病,也被日本宪兵带到祁齐路的特务机关问话。他在书里记下这些经历时,常常透露出一个个平头百姓在乱世里的本能:能躲就躲,躲不过就硬着头皮上。他给吴四宝的人看病时,想的是“如果治愈此人的病症,不过是完成了医生的责任;要是病人有三长两短的话,可能给你戴上一个帽子,扣留禁闭起来也说不定”。这种揣测,精确、真实,带着小人物面对强权时的战栗。

整本书里,陈存仁真正动了感情的,是“小汪”那段。这个挂号先生是江阴人,父母兄长都被日军刺死,他隐姓埋名在陈存仁诊所里做事,暗中截留了三楼房客谭宏道的电报和信件。谭宏道是黑龙会驻苏浙皖三省主任,一个不露面的大汉奸。小汪收集了八十多件证据,分投多个机关,最终把谭宏道父子连同藏在他家的八个日本特务一起送上了刑场。陈存仁在书里写道:“上海四百万人口,除了汉奸之外,人人口说抗日,但是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打死一个日本人,甚至连汉奸都不敢碰一碰,而你竟然以一人之力,杀死了两个大汉奸,八个日本特务,你真是——一个抗日大英雄!”

全书收束于抗战胜利那天,陈存仁说自己“八年来第一次感到真正的痛快”。全书最后一节,他用了一个词:“以德报怨”。那是当时政府对日本的态度。陈存仁又在后面补了一句:“时至今日,日本反而暴露‘以怨报德’的姿态。”写这句话时已经是一九七九年,他身在香港。

这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陈存仁没有档案,没有系统性的史料梳理,全凭记忆和当年的日记写就。他写褚民谊踢毽子、拉马车、演昆曲,写傅筱庵被厨子阿朱用菜刀砍死,写盛文颐的鸦片箱子上贴着“宏济善堂封”的封条,写吴四宝在纱布交易所带枪手喊价。这些细节,也许在正史里记录的是时间、地点、事件和影响,而陈存仁记录的是体温和气味。

作家阿城在封底评道:“写老上海的书,这一本最好。”翻开这本沉甸甸的老书,读者能真切地感觉到阿城所说的好在哪里——作者不写判断,只写自己“在场”。他的诊所开在威海卫路二号,正对跑马厅侧面,他坐在二楼露台上就能看见日军的一举一动。他不是回忆一段历史,而是在交代自己那八年的日子是怎么一天天挨过来的。

书里写到的很多人,最后的结局都是“死”。褚民谊被枪决,傅筱庵被砍死,吴四宝被毒死,盛文颐不知所终,林之江在香港的精神病院院里惊悸而亡,那个勒索朱子云的法官赵钺铨后来也被枪毙。陈存仁不评价这些人的善恶,他只是记下他们的来路和去路。

笔者注意到后记里陈存仁的儿子陈树桐写的一段话。他说父亲一生保持每天至少写作两个小时的习惯,从不中辍。这种习惯需要极强的定力,而陈存仁的定力,大概和他从少年丧父到乱世行医的坎坷经历中所磨炼出来的沉稳心性是分不开的。他二十岁就在诊所里穿深色长袍,戴瓜皮帽,把自己扮成小老头;二十八岁主编三百万字的药学大辞典;四十岁在沦陷的上海每天完成上百个门诊,同时应付日本宪兵、汉奸、绑匪和饥饿。

全书四十多万字,写完时陈存仁已七十多岁。他有些地方记不清年月,有些人的名字也模糊了,但他反复说“再不写出来,再过几年更加糊涂了”。这本书的价值正在于此——它不是站在高处俯瞰历史,而是贴着地面行走,让后人看见战争不只是地图上进退的箭头,更是育婴堂里婴儿的啼哭,是米铺门口的长队,是一盏昏暗电灯下勉强吃完的晚饭。